



No. C2012009

2012-11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余淼杰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o. C2012009 2012年11月13日

摘要：近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使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为避免中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升级和企业生产率提升是最有效的方法。本文从多个角度运用大量微观数据论证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实现了工业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产业升级。大部分企业也实现了生产率的明显提高，出口更专业化的、差异化明显的产品，有很多因素都可以解释这样的经济奇迹，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无疑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两股动力。

目前，由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产业升级的这两股动力在不断地被削弱和被弱化。国内因为劳工成本上涨、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导致我国劳力密集型产品国家竞争力削弱；国际上则因为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疲软。所以，本文提出，要保证我国在下来的第二个十年产业继续升级，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我们得转换改革开放的思路，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转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主要出口国，加强主要的自贸区建设，对内开放国内各要素市场准入，深化经济改革，实现产业提升。

关键词：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产业升级，企业生产率提升，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

JEL: F1 F2

¹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系电话：86-10-6275-3109，传真：86-10-6275-1474，邮箱：mjyu@ccer.pku.edu.cn。本文为第二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论坛）录用文章。感谢林毅夫教授、姚洋教授对本文的非常有益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一、 引言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保持快速的增长速度。本世纪以来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超过10%。如果按照当前美元价格计算，如今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美元计价）在7.78万亿美元左右，约占美国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更可望在2014年追上美国（Feenstra, 2012）。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超过5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分类，这一数字高于3946美元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门槛。

此外，第二产业一直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来源。中国第二产业的规模在2010年达到2.76万亿美元，约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9%。经过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第二产业平均年增长率在1997-2009年间维持在13%的水平。显然，制造业已经在当今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中国已成为全球的“加工厂”。不过，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工业制造业能否实现转型升级，价值链得以提升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即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问题。具体地，本文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产业价值链提升为什么重要？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产业价值链有没有升级？第三，当前产业升级面临什么挑战，动力是什么？这些动力因素目前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促进产业升级？第四，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如何才能促进产业升级？

二、 产业价值链提升的重要性

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其收入由最不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低于3666美元）升到中等收入国家时（人均收入在3,666-10,000美元间），经济很容易从此徘徊不前，人均国民总收入无法继续快速爬升，从而无法顺利迈进高等收入发达国家行列——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类似经历的国家有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南非。当然，另外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也成功地摆脱了这种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比如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在1987年时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韩国也于2001年实现了这一目标²

为什么这些国家会掉进“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或自然资源丰富。它们根据本身的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要把人均收入从低收入水平提升到中等收入水平，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随着GDP增长，工资相对上升；同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的进一步下降。再者，自然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稀缺，原先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经济学界在这点上有一共识，就是得大力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绩效，从而实现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以升级。判断产业是否升级的指标当然有不少，但对中国而言，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国际比较窗口。如果一国的出口产品的“出口复杂度”高于其他国家，则该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可能性比较低。因此，我们运用Rodrik（2006）提出的“出口复杂度”（EXPY）指标计算了各

² 中高收入国家的分类可查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a-short-history>.

国在 2008 年的“出口复杂度”³。所谓出口产品复杂度，就是指一国所有出口行业收入的加权平均值。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越高，它生产的产品就越尖端，技术含量就越高，也就越容易实现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我们首先在图 1 列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个国家（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南非）以及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另外几个国家（日本、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然后再用中国的“出口复杂度”与它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1）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其他国家在近 10 年内的出口复杂度呈上升趋势；（2）未摆脱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比成功摆脱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水平较低；（3）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水平比未摆脱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要高，和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相近，甚至较高。前面两点的比较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品出口复杂度越高，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越低。而第三点发现则启发了我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产业价值链有没有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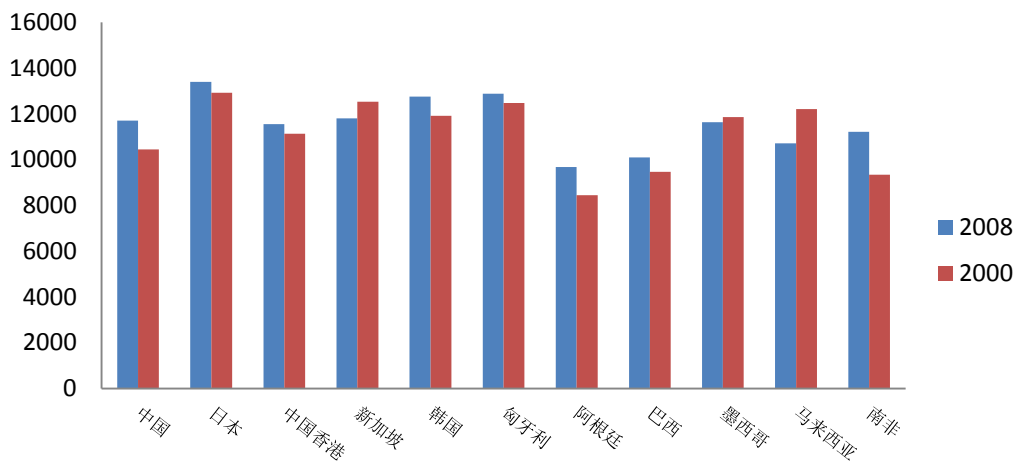


图 1：中国与经历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出口复杂度水平比较

三、中国产业链升级的经验事实

³为了衡量中国出口的复杂度，我们使用了 Hausmann（2006）和 Hidalgo（2007）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即构建一个指标，将一国人均 GDP 包含在出口指标中。这可以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是构建一个包含人均 GDP 平均值的指数（PRODY），用每个行业的比较优势程度来作为权重。

$$PRODY_j = \sum_c \frac{(EX_{jc} / EX_c)}{\sum_c (EX_{jc} / EX_c)} Y_c$$

式中分子中的 EX_{jc} / EX_c 是 c 国内行业 j 的出口额与出口总额的比例，

分母 $\sum_c (EX_{jc} / EX_c)$ 是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出口比例进行加总。 Y_c 是 c 国的人均 GDP 值。换言之，

PRODY 指标可理解为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指标。因此，PRODY 指数可以用来避免因国家收入水平变动而导致的行业扭曲。为了更明白的说明这一点，下文中我们构建了表明收入（生产率）水平的 EXPY 指数，用来衡

量某国的一揽子出口品的情况： $EXPY_c = \sum_j \left(\frac{EX_{jc}}{EX_c} \right) PRODY_j$ 这里，EXPY 指标是 c 国内所有行业的

PRODY 指标的加权平均数。

本部分探索新世纪以来中国产业链升级的经验事实。之所以把研究的时间维度集中在新世纪，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在新世纪保持着高速的发展。其二，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我们可从企业微观层面来分析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⁴。

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分析了制造业由劳力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甚至高科技产品的变革。价值链的升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行业间的生产“宽度”和行业内部的生产“深度”。接着我们从生产深度和中间产品投入来研究加工贸易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作用。最后我们根据详细到企业水平的数据，采用可靠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衡量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结果均证明中国正在进行着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如前所述，因为我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通过外贸来了解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个比较理想的窗口。我们首先考察各行业之间外贸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农产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35%，而工业制品出口占 65%。工业制品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 65%。今天，中国的贸易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 2007 年时，工业制品占出口总额的 96%，重工业出口占 86%。其中，高资本密集度产品出口又占了 73%。同时，工业制品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 77%，而机械制品和运输设备的进口占其中的 44%。

表 1. 中国行业内贸易比例变化

年份	农业	制造业	轻工业	重工业	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
出口比例					
1980	34.93%	65.07%	44.41%	55.59%	21.80%
1990	18.73%	81.27%	27.22%	72.78%	20.17%
2000	7.29%	92.71%	19.02%	80.98%	42.32%
2007	3.47%	96.53%	19.02%	80.98%	55.12%
进口比例					
1980	34.10%	65.90%	31.81%	68.19%	61.48%
1990	16.48%	83.52%	20.48%	79.52%	54.02%
2000	14.39%	85.61%	23.44%	76.56%	68.48%
2007	16.23%	83.77%	14.43%	85.57%	7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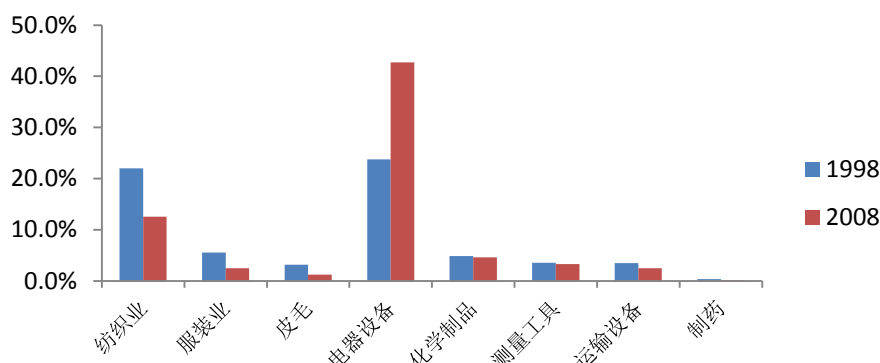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新世纪以来，我国出口与 GDP 之比在 35%左右，出口占第一、二产业产值的 60%。为了解中国如何实现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我们集中考察了劳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出口比例（即某一行业的出口量与所有行业总出口量之比）。如图 2 所示，电器行业在 1998 年时有最高的行业出口比例（23.7%），其次是纺织业（22%）。鉴于中国是个劳力资源丰裕的国家，因此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纺织业出口是再正常不过的。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预测劳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中国）会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制品。

⁴在 1998 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开始提供含有所有国有企业和年营业额超过 500 万人民币的非国有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

但奇怪的是，中国却存在着大量的机械产品出口。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现象愈发明显。正如图 2 所示，2008 年时电器设备的出口比例上升至 42.7%，与此同时，纺织业的出口比例下降到了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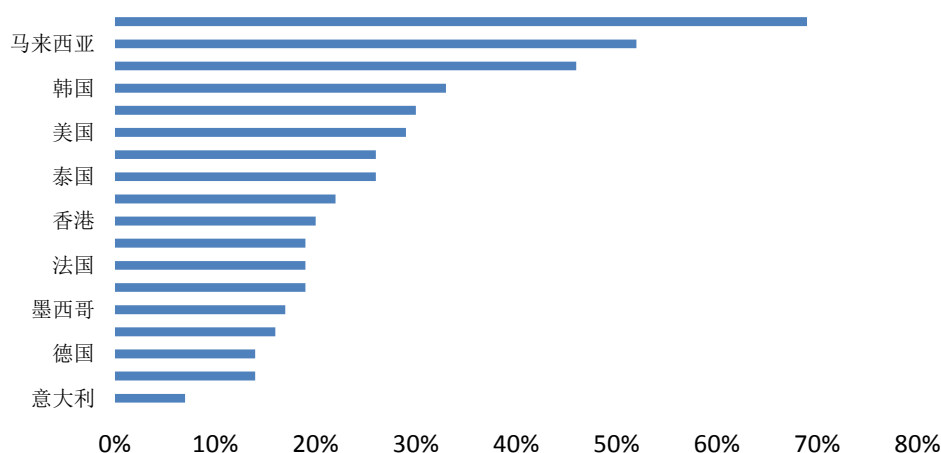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主要产业的出口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行业出口比例的定义是行业出口与当年出口总量之比

更有意思的是，我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有明显份额。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大量出口成为中国的价值链升级的重要特征。如图 3 所示，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 30%，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美国。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产品中大部分是计算机和通讯产品，占 2009 年中国的高科技出口总额的 74.2%。其他重要的技术产品包括电子产品（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 13.3%），光电技术（5.9%）和生科技术（3.2%）。

图 3、各国高科技行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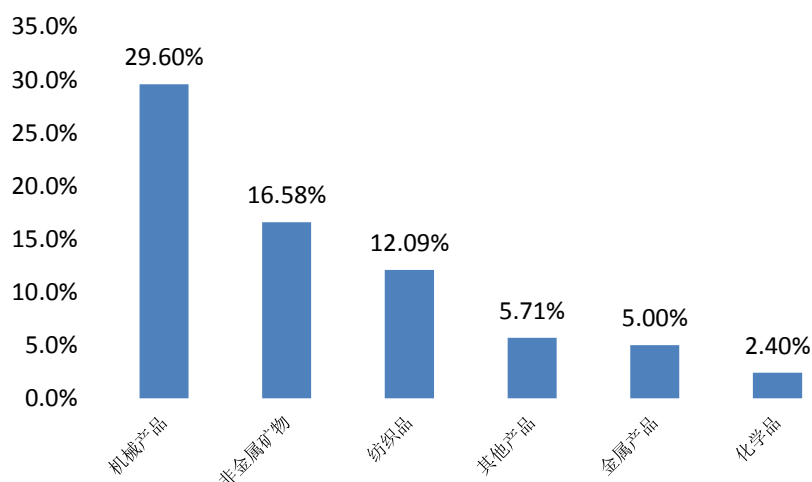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2007 年），世界银行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能够有大量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借力于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墨西哥和越南）中很普遍的一种贸易模式。国内企业首先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然后利用国内的加

工技术进行加工，进而将最终产品向国外出口。为了鼓励加工贸易，政府通常为待加工的中间产品提供关税减免。

我们从以下两个角度检查加工贸易的发展情况。首先，到底是哪些行业用了较多的进口中间品呢？图 3 表明，机械部门和非金属矿业部门使用了大量的进口中间产品（比例分别为 30% 和 17%），而纺织业只使用 12% 的进口中间产品。这与直觉相符：机械行业大量使用了从日本和韩国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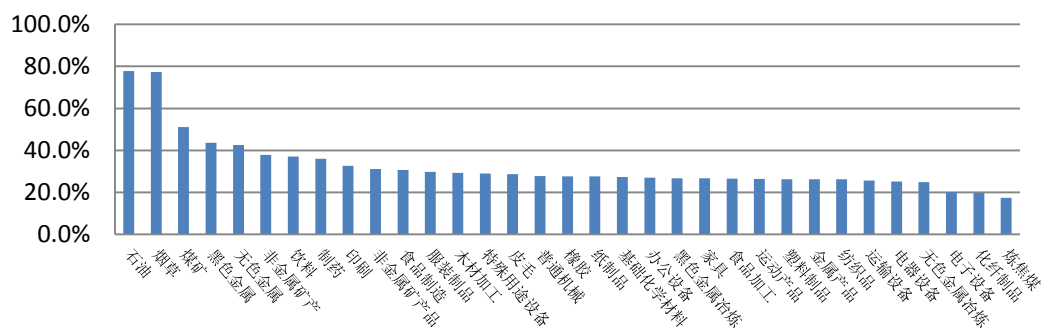
图 3、中国不同行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比例



数据来源：行业总投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进口中间投入品数据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其次，哪些从事加工贸易的行业产品的附加值较高呢？图 4 按照产品的“生产深度”（即产品附加值除以产值）对所有的制造业进行排序。可以看出，矿业的附加值较高而电子设备的附加值较低。以苹果公司的 iPod 为例。我国生产的一台 iPod 的出口值是 209 美元，但在我国实现的产品附加值只有 9 美元。不过，这也就引出相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产业能够实现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提升呢？

图 4、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产出比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我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不同的产业附加值实现之所以大小不同，最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的生产率高低不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出的：“生产率不是全部，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实现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利润，从而推动了整个行业利润率的上升，并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产品链得以提升。他认为，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靠的只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才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遭到重创。那么，我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生产率如何呢？生产率有没有逐年得以上升呢？

表 2、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000-2007）

中国行业分类代码（2位数字）	劳动力		资本		全要素 生产率 (OLS)	全要素 生产率 (OP)
	OLS	OP	OLS	OP		
食品加工 (13)	.510	.443	.262	.323	4.338	4.120
食品制造业 (14)	.487	.423	.285	.424	4.033	3.166
饮料制造业(15)	.522	.453	.305	.037	3.806	7.210
纺织业(17)	.490	.439	.255	.199	4.110	4.832
服装、鞋、帽制造业(18)	.485	.508	.238	.339	4.230	3.322
皮毛制造业(19)	.482	.494	.274	.364	4.086	3.295
木材加工及制造，竹、藤、棕、 草制品(20)	.491	.439	.250	.410	4.295	3.362
家具制造业(21)	.551	.569	.212	.400	4.268	2.705
造纸及纸制品业(22)	.556	.500	.271	.249	3.728	4.174
印刷业(23)	.504	.472	.284	.031	3.774	6.066
文体教育类 (24)	.509	.505	.218	.139	4.235	4.876
石油加工、炼焦及燃料(25)	.372	.268	.421	.478	3.383	3.345
化学原料制造 (26)	.395	.329	.340	.248	4.124	5.196
医药制造业(27)	.505	.503	.313	.481	3.928	2.404
化纤制造业 (28)	.494	.341	.336	.510	3.590	2.713
橡胶制品业 (29)	.420	.374	.335	.414	3.884	3.452
塑料制品业(30)	.435	.434	.298	.561	4.110	2.067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31)	.383	.303	.296	.296	4.412	4.796
黑色金属冶炼及冲压 (32)	.548	.476	.332	.512	3.617	2.385
有色金属的冶炼及冲压 (33)	.482	.377	.293	.411	4.173	3.655
金属制品制造业 (34)	.469	.408	.304	.448	3.932	3.052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485	.388	.291	.269	3.989	4.611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	.483	.426	.270	.050	4.231	6.32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7)	.538	.435	.322	.293	3.545	4.300
所有行业	.455	.407	.311	.283	3.752	4.267

注：受篇幅所限没列出标准误，但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要。

目前，学术界衡量生产率通常有两种方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即是企业产品附加值除以工人数，它的优点是计算方便，但缺点是太过于简单，无从衡量资本和中间的贡献，因此，比较可靠的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的生产率，它的衡量通常是用观察

到的产出和最小二乘（OLS）估计值之间的差距。我们因此用了国家统计局收集的大中型“规模以上”企业样本来衡量我国企业的生产率⁵。

表 2 列出我们估算的中国各个工业制造业的劳力、资本弹性系数。我们据此可计算企业的生产率（结果列在最后两列）。从中可见，我们各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通过计算各年的增长率，Brandt 等(2012)根据中国企业的生产数据发现，在 1998-2006 期间，使用总生产函数计算的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 2.7%。而我们发现：如采用附加值来计算，平均而言，在新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 7.5% 左右——我国企业的生产率有较大的增长！这既解释了为什么我国能够实现产业链升级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我国为什么宏观经济能够保持 8% 左右的年增速。

四、我国进一步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

上面大量的经验典型事实已证明：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我国的确经历了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更进一步地，我们想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产业升级：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首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可以支付相对较低的工资(林毅夫，2004)。给定其他因素不想变，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能够有充分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姚洋和余淼杰，2009）。在改革前二十年中，我国出口的大部分是服装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正是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是一致的。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理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目前，中国加工贸易之所以能占我们外贸的“半壁江山”，也正是利用了我国低价的劳动力优势。

而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中国产业能升级，价值链得以提升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得益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正如克鲁格曼所强调的：比较优势不是各国的贸易唯一的原因。规模经济是另一种贸易收益的来源。国家还可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从贸易中获得受益。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规模不仅在国际上不断扩张。中国的国内市场更是在新世纪蓬勃发展。例如，到 2009 年底，中国已实现 150 万台的汽车销售量，从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那么，因为劳动力便宜而使中国在劳力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还能不能存在呢？同样，加入 WTO 后得到的市场扩大效应会不会继续自动的发挥它的作用呢？换言之，我国较大出口市场规模能不能继续得到保证呢？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得正面的回答，那下一个十年产业的升级，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就得不到有效的保证。

先来考察一下我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变化。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工资成本已是大幅上升，并由此逐渐辐射到中部内陆省份。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人口抚养比上升速度较快（姚洋和余淼杰，2009）。虽然学术界对我国目前是否已达到“刘易斯拐点”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却并无异议。虽然我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相对较低，但相对于越南等东亚国家却相对较高。由于这些东亚国家出口也多为劳力密集型产品，所以我国工资水平的相对上升也就削弱了我国在劳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国家竞争优势。同时，由于我国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就会更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劳力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实现。

再来考察一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由于受 2008 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目

⁵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是用观察到的产出和最小二乘（OLS）估计值之间的差距。然而这种方法通常存在联立因果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所以我们采用了 Olley-Pakes (1996)方法来克服这两个问题，详见余淼杰（2010）。

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同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变化有三个：第一，传统的主要出口国经济乏力。一直以来，欧美日都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但目前在欧盟，在严重的欧债危机重创之下，欧盟大部分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平均 GDP 增长速度只能在 0.7%~1.5% 之间。而日本，自 2011 年遭受地震海啸核辐射三重天灾人祸后，短期内经济难以复苏。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失业率更是一直居高不下，持续稳定在 8% 左右，近期因美国政府虽采取“制造业回流”等多项刺激政策，经济停滞滑坡但依然增长乏力。

第二，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我国同其他发达国家（包括出口产品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有更多局部贸易摩擦。有学者预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第二个十年将停滞不前，长期的低增长将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常态”。为保护本国就业，发达国家必将会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势不可免。比如，近期由于中美存在巨额的双边贸易逆差（2011 年中美贸易逆差近 2200 亿美元），美国势必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针对某些行业的反补贴、反倾销的“双反”措施，以保存本土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那些行业会首当其冲呢？主要是在一些两国间竞争力势均力敌的产业，或者说，是两国比较优势都不明显的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光伏产业、铜版印刷纸等。

第三，为了促进美国的出口，2011 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力推目前已有 9 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强调将建成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FTA），十年内实现区内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商品的零关税，并涉及市场透明、金融监管等领域。TPP 生效后，美国会从越南等东亚国家直接进口纺织类等劳力密集型产品，原因很简单，虽然中国的同类劳力密集型产品比东亚各国成本相对较低，但因为 TPP 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是零关税的，这就使得中国同类产品出口中处于不利地位，美国转而从东盟各国进口。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受到负面的冲击。以上这三个方面都说明了我国面临的出口国际市场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并不乐观。

五、进一步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要保证我国能进一步顺利的产业升级，笔者以为在下来的十年中，我们应该对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政策方向进行调整，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方向应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对外改革不是不要开放，而是说要如何更好地搞好开放，开放的方式和内容需要改革。对外改革的第一点是转变出口主要目的国。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欧美市场上，而应该化整为零，发扬“敲牛皮糖”技术，把出口目标瞄准一些新兴工业国，具体包括巴西、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十国。毕竟，巴西经济发展迅猛，市场吸收能力强劲。除此之外，俄国也应该是我国出口的一个主要目的国。理由很简单，俄国今年正式加入 WTO 后，其进口关税必定大幅下降，这就让我国产品更容易进入俄国市场。总之，我们应该选择若干个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重点开拓，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

对外改革的第二点就是要努力做实东盟 10+3 自由贸易区。目前东盟 10+1（中国）已有一定基础，但还是要把中国与东盟 10+1 自贸区做实，当前，东盟国家对我国出口比较容易，而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进展缓慢，原因在于东盟并没有对我国产品实行零关税，而我国对东盟 93%~97% 的产品都实行了零关税。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目前日本朝野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对日本经济的正面促进作用（高桥五郎，2012）。因为日韩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中间品进口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所以，“中日韩自贸区”对促进我国的外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外改革之三是调整加工贸易方式。首先要减少来料加工比例，增加进料加工比重。而在进料加工中，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应成为一句空话，毫无疑问，中国的加工贸易促进了就业，但问题在于最终出口品附加值太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唯一方法。而如何转型升级呢？则重在研发投入。不过，研发有两种，一种是对传统工序的优化和创新，另一种则是生产全新的产品。我们的研发重点应放在第一类。一方面是因为对传统工序的改进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这主要是因为对新产品的创新我们不见得比欧美各国明显的比较优势。

同样，对内开放不是说不要改革，而是说国内市场应该更开放。对内开放的第一点是减少地区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大多企业老板都有感受，在国内做生意比在国外难得多，成本也要高。国外虽然距离较远，直接成本较高，但毕竟成本标准化、透明化。而国内市场，地理距离虽然有限，但无数的过桥费也使直接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更不说生意背后无数可能的非透明成本。所以，对内开放的第一步就是要取消省际、市际的各种形式的地区贸易壁垒。

对内开放的第二点则是开放企业融资渠道。目前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融资渠道贫乏、融资成本较高。中小企业一方面无法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另一方面也不容易向国有银行贷款，普遍面临着较严重的信贷约束，而这又限制着企业的出口。所以，对内开放的第二点重在于应向中小企业开放融资渠道。一个可能的办法则是鼓励建立中小银行专门处理中小企业借贷。

对内开放的第三点则不妨开放城门，逐步限制并取消户口管理制度。户口管理制度自 1958 年生效以来，已有半世纪，作为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必要的配套政策，到目前已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障碍之一，应立即予以取消。

六、小结

近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使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实现了工业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产业升级。中国的企业也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出口更多复杂的、差异化明显的产品，甚至是高科技产品。这主要高科技产品中相当部分是加工贸易。不过，扣除掉加工贸易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依然在三十年中有明显的产业升级换代。有很多因素都可以解释这样的经济奇迹，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无疑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两股动力。

目前，因为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产业升级的这两股动力在不断地被削弱和被弱化。国内因为劳工成本上涨、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导致我国劳力密集型产品国家竞争力削弱；国际上则因为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疲软。所以本文提出，要保证我国在下来的第二个十年产业继续升级，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我们得转换改革开放的思路，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转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主要出口国，加强主要的自贸区建设，对内开放国内各要素市场准入，深化经济改革。

参考文献

- Brandt, Loren,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Yifan Zhang (2012),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 pp. 339-351.
- Rodrik, Dani (2008),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China & World Economy*, 14(5), pp. 1-19.
- Feenstra, Robert (2012), "中国有多大?" 《经济学(季刊)》, 11(3), 第367-382页。
- 林毅夫(2004), 《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 北京大学出版社。
- Olley, Steven and Ariel Pakes (1996),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Econometrica* 64(6), pp. 1263-1297.
- 姚洋和余淼杰(2009),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金融研究》, 2009(9), 第97-110页。
- 余淼杰(2010),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 2010(12), 第97-110页。